

新儒家思想史

说 明

《新儒家思想史》一书，系张君勱以英文结撰而成。1952 年，张氏旅居美国后即发心撰述是书，历时 11 年全书告竟。1957 年，是书英文版上册在美问世，6 年后英文版下册付梓。书中要点曾译为中文陆续在香港《人生》杂志发表，1980 年 8 月后始由程文熙着手将全书译成中文。程氏译稿后经江日新校订，于 1986 年 2 月由台北弘文馆出版社出版印行。

是书所谓“新儒家”，乃相对于先秦原创性儒家而言，是指生发流变于中唐韩愈以迄晚清曾国藩间大约一千年之久的儒学新思潮。作者审慎而详尽地考辨这一始终涵淹着道统认同却又不无新的精神性状创发的思潮的嬗演，意在为文化危机中的现代人提供一种儒学再度复兴的历史启示。

本卷编选是书，系据台北弘文馆出版社所出是书之中文版。

前 言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写一部讨论新儒家思想的著作？对我来说至少有两个理由。第一：由世界上发生的诸事端看来，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应当从一新的观点再作考虑。而以相当公平的态度来说，我以为到如今为止，研究中国的方法，是相似于研究古希腊、罗马和埃及，即以她为一断绝的文明来看待她！而那个怪字“汉学”(Sinology)的存在，似乎暗示著是在对这个文化做“验尸”的工作(Post-mortem examination)亦即表示西方学者相信中国文化在今日已不再有生命了。不消我说，这样的作法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中国藉著许多以不断发展的鲜明历史产生强烈自觉，而使文化变得生机蓬勃；她是一个生命体，而不是一个博物馆。

自从开始研究中国文化以来，将它视为博物馆的取向就无法避免了。在其中有一些目标被视为比其他更为有趣；因此，许多年来，西方学者的努力，多集中于一个连续但又常是陈旧的，即孔子、老子及他们同时代学者及继承者基本思想的解说，而对于最近一千五百年的思想系统，据我所知，则没有做过任何研究。

我相信现在已到了要找出一个新取向的时候了，中国深广的文化传统犹若一个变化无穷的景观——其中的山峰、高原和肥沃的流域对整体景观都有同样的贡献；例如一条溪流：漩涡、充满苔痕的河岸；急流奔流和瀑布飞泉也能加添这溪流的美丽。

“新儒学”一词是指自唐以来儒家的新学派而我于此书中试

图以谨慎但仍不完美之方式，叙述从唐代开始，经由宋以迄于清末的思想趋向。这段时间超过一千年 约略等于从丹麦人入侵，下迄维多利亚女王（Victoria）统治结束的美国历史。我这个导论的工作，若能使西方读者暂时离开对高耸山峰的注意，而激起他们对其他知识领域能有部分的兴趣，即使是有限的，也仍算是成功了。

第二个理由是经常有很多人问我：共产主义是否会在中国生存下去？换言之，他是否取代了中国传统思想和生活方式？依我看来，一个如此受人注目的重要问题；一个古代文化的整个精神和知识生活（spirit and intellectual life）不能由一个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来答复、解决。不过本书所欲检讨这阶段的中国思想，其中有一个并驾齐驱的时代可能供给我们一些重要的教训。倘若今日在中国人生活中扮演这样重要角色的共产主义是一外来思想，则佛教在事实上是第一个非中国思想系统并且能在中国意识中生根的。

但是我不相信这个类似性更能行之久远。我承认（submit）现在共产主义对于大陆人民生活的冲击是强烈 甚至是决定性的。但是我坚信它根本上只是一个政治和经济或社会的配置（arrangement），最多只是为达到某些国际目标之手段而已……

很明显的，佛教的影响所发生的作用是极不同的；它正面的进入中国思想的精髓中。若一定要做比较的话，则其影响可视为亚里士多德主义对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结构的冲击，或希腊主义对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思考的冲击。在所有这些个例子，我相信其所造成的变形是抵入其核心而非仅止于边缘！因此能产生一个新的智慧和精神的实体（entity）。同样的，一经佛学研究的沐浴后，丰富的思辨方法便有机会自由地在中国人民心灵中扮演角色，并以

此之故 中国思想要维持传统不变也是很不可能的。即使如此 几百年后，我们发现一些较早期中国思想的基本价值，仍被保存而没有受损；并且，中国的佛学本身却得到了中国风味。很明显的，中国仍是中国，印度还是印度。在这本书的章节中，我要处理自唐朝韩愈以下所有成熟的中国思想家，他们虽曾受佛教影响，并且他们的进向和研究方法已经过激烈的转变；但仍很明显的可以指出他们还是固守著他们的传统。我不同意许多观察家的观点 即认为共产主义能对中国人的意识做根本侵蚀……

撇开以上所说的，我们必须牢记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赢得信徒，只是因为正统西方思想并没有做到其所当为。第三十二章“西学东渐时代之思想界”正试图表明这个失调如何发生，我想若被介绍到中国并为中国思想家所熟悉的只是相当进步的科学和技术，及西方民主政治和行政的演进，而同时没有伴随著侵略及帝国主义所引起的苦痛甚至憎恨；则中国现在的地位必会是相当不同的……（编者略）但是实际上整个十九世纪，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与文化和精神层次同样，西方对中国的冲击是以废绝为目标。他们要求中止中国一切传统价值，甚或中止她的身份。那即是何以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上，学者经常采取博物馆的取向，然而“期望常是思想之父”的讲法似乎有它的意义 结果中西的关系以对立、挫败和反抗代替了友善的合作和自动自发的吸收。

我希望本书藉表明佛教与中国思想的关系，使读者深信丰富的西方正统的思想形式，就如其表现于对自然系统的探究和理解，对自由、平等、正直的理想及个人尊严的热爱，与民主的共同感受 而使中国一方有友善的回应及接受 我想这不但是需要的 而且这一项工作必须藉一完整而新的进向方才能够达成。……（编者略）若有一事我能确切描写我的国人，那就是他们基本上是头

脑清楚而且理智的，他们所尊重的东西是有重心的。他们本心上是正统的国民，因为正统经常代表基本而永恒的价值。他们不是自然或是训练成的非正统派，只有在不得已、到绝望的情况下，他们才变得如此。

能在此对曾帮助我做这本书准备工作的朋友表示我的谢意，是我极乐意做的一件事，这些朋友没有一个不是大量的给予我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对于我所提出的任何观点，他们没有必要负任何责任，这些都是我自己所发表的。本书是长时间在国会大图书馆中安静而愉快的研究下写成的。我深致谢意于图书馆人员、东方部门的同仁和吴博士 (Dr. K. T. Wu) 及他的同事对我的好意。恒慕义博士 (Dr. A. W. Hummel) 阅读过整个原稿，给了我特别在语文方面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另外他更为我写了一篇序言；爱德温·比尔先生 (Mr. Edwin Beal) 阅读了顾炎武和朱舜水章；我也要深谢普尔门博士 (Dr. Poleman, Horace I.) 帮助梵文的翻译；对苏特博士 (Dr. Rufus Suter) 经常给我的鼓励，他对西方哲学的认识和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对这项工作都具有莫大的价值，使我非常感激。

最后，我必须表示我对我的朋友，长岛大学的研究教授张歆海博士衷心的感谢，在准备与写作这本书的每一个阶段，他都给我长时间的协助，他置他对东西方广博的知识于我的需要之下，我只能说没有他的帮助，我是无法完成这本书的。馀则不赘！

张君勱 一九五七、三、十五于旧金山

第一章 导论：中国历史上的儒家 及其与西方哲学的比较

中国是儒家的天下。中国人的人生观极大部分是受孔子的影响；说得更正确一点，我们可以说，儒家的观点建筑在中国古代传统之上，因此，孔子和中国人的观点，都是从这个根源而来的。

中国人的这种观点肯定人类世界和现实生活。所以中国人最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肯定人生事务，认为与邻人和睦相处为人生第一要务。

儒家思想方式与实际人生或生活具体事实中所表现的有关。这种思想方式不崇尚抽象的讨论。这不是说，儒家对于与生活有关的普遍原则也没有兴趣。孔子就喜欢追求外界的知识。他劝告弟子多认识虫鱼鸟兽草木之名^①。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博学而未成为一技一艺名家的人^②。

孔子门下有众多弟子——三千左右——因此，他也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周游列国，希望找一个实现自己改革理想的机会，可是，一直到他年老的时候，这个机会都没有出现。在诸侯之中没有一个国家用力于古籍的纂述。这些古籍后来成为中国的经典。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儒家是不是宗教？中国人把孔子看作圣人、导师、个人人格修养的典型。甚至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

^① 《论语》第十七《阳货篇》第九章。

^② 《论语》第九《子罕篇》第一章。

以后，儒家和佛家两套思想体系也立于同等的基础之上，这两套思想体系的拥护者之间，虽时有争论，但从未产生儒家是不是宗教的问题。直到中国和西方接触以后才发生这个问题。欧洲来的传教士——最初是十七世纪的天主教传教士，然后是十九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总觉得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过，耶稣会和多米尼教团传教士只涉及崇拜祖先的问题。基督教传教士则集中注意力于儒家宗教的一面。

例如，苏赫尔（W. E. Soothill）在他所著《中国的三大宗教》一书中说：“中国有三个被承认的宗教。在三大宗教中，儒家通常被视为国教，但是，道家和法家也是被承认的。佛教从印度传入，儒家和道家都是本土宗教，是从同一根源产生的。原始宗教源于史前时代相信灵魂存在之说，可是，在儒家和道家分道扬镳以前，这种原始宗教早已达到相当高的阶段，不过，仍然保留着它的灵魂说和神奇因素。”^①

苏赫尔的前辈，牛津大学名教授，亦即经书的翻译者李格（J. Legge）以“我用儒家两字，主要是概括中国古代的宗教”这种态度，企图在他所著《中国的宗教》一书中回答“儒家真是宗教吗？”这个问题^②。

我要特别强调，这种解释儒家的方式完全是西方的。中国学者一定觉得奇怪。

中国人从来没有把孔子看作是先知或教主。孔子也从来没有

① Soothill: 《中国三大宗教》第二十四页。该书为牛津大学版，一九二三年伦敦出版。

② J. Legge, *The Religions of China*,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881 P. 4.

自称为主或光。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 好古敏以求之者也。”^①
又说：“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 未知生 焉知死？”^②换句话说 孔子根本不想谈超现实世界或创立宗教。

苏赫尔和李格尔氏认为儒家思想中含有中国宗教的原始观念，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中国宗教的根本观念是产生在几千年以前的，是产生在一个孔子无法证实（accountable）的时代的。孔子只是继续遵守过去许多世代留下来的礼俗，可是，这并不等于建立一种礼拜的方式。

下面是孔子自己关于宗教方面所说的话：“祭如在 祭神如神在”，^③换句话说，孔子采取“如”（as if）的态度，正和他对来生的态度一样。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过去两千年中，没有一个中国学者把孔子看作宗教的创立者。印度、阿拉伯或巴勒斯坦有这种宗教的创立者——但中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儒家思想看作一套伦理或哲学体系而不看作宗教的缘故。

儒家不但不是宗教 甚至当作伦理或哲学体系来看 在历史过程中也经过很多变化。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全貌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百家 时期与各家并立的儒家；（二）前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期的儒家；（三）为佛道两家势力掩盖时的儒家；（四）再生的儒家或儒家的文艺复兴，即本书所谓新儒家的特别主题。

① 《论语》第七《述而篇》第十九章。

② 《论语》第十一《先进篇》第十一章。

③ 《论语》第三《八佾篇》第十二章。

（一）百家时期与各家并立的儒家

这个时期是中国思想史开始的时期；也是春秋时期，孔子的论语就是产生在这个时期，他的伦理和哲学观点都包含在这本书中。孔子主张“正名”所谓正名，意即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身份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去完成自己应尽的义务，那么，社会就会井然有序。我们还知道，孔子提倡仁，把仁看作其他一切德行之根本，或培养其他一切德行的起点。虽然他说过他的道可一以贯之，可是，却用种种不同方式讨论道德问题。他将自己思想比作“逝者如斯，不舍昼夜”^①的流水。

曾有隐者劝他不要自找麻烦，不要存着拯救人类命运的念头。从这些隐者的话中，我们可以想到，他们是道家，因此，都是与孔子相对立的。

另一派反对孔门的是墨家，因墨子主张兼爱。兼爱之说和孔子主张的由亲而疏的爱相反。墨家主张薄葬，非乐。墨子摩顶放踵辛勤不懈地宣扬他的主张，无疑的，他协助宋人谋划防守京城一事，大家都知道，这对他的成功有很大的帮助。

战国时期（公元前四八〇年——二二二年）孟子继承儒家的传统。他阐扬孔子的学说，比孔子本人更详细。孟子提出一套主张，提出人性本善以及直觉知识之说。他强调理性心的功用，主张政府应该实行仁政，应该效法尧舜。尧舜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相当于柏拉图笔下的哲人王。

虽然在理论上孟子有助于儒家，可是，在要求诸侯的实际支

^①《论语》第九《子罕篇》第十六章。

持方面，和孔子比起，不见得更成功。在孟子那个时期，最享名的，要算苏秦、张仪这类的纵横家，张仪倡连横之说，主张六国亲秦，苏秦则主张合纵之说，联合六国共同抗秦。从某些方面看，这些纵横家很像古希腊时代的辩士，他们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们的主张，关系许多王国的命运——秦或其他六国。

孟子时代另一派享名的是法家。商鞅、申不害、韩非、李斯之徒，主张严刑峻法，取消贵族特权，实施成年男子普遍兵役制度以及增加粮食生产。法家认为：“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佚无战。国有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敌不至必贫。”^①这些话显然是攻击儒家。

无疑的，与法家比起来，孟子对封建诸侯没有献出更好的意见。而且，法家还知道如何适应当时的种种问题。因此，在当时政治上握有实权的，不是孟子而是法家。

与孟子同时的另一位儒者荀子，虽与孟子一样，也发扬儒家思想，可是方向不同。荀子说自然之性。因此，在中国思想史上，荀子是性恶论的主张者。他弟子中一部分人成为法家。

战国时期告终以及秦始皇大一统帝国之建立，乃纵横家及法家两大势力的结果。在这些政治事务方面，儒家所扮演的角色只是旁观者。他们对实际政治无所献替。他们是理论家，不是实际政治的代表者。

在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四七九）和孟子（公元前三七二——二八九）在世时期，甚至后来的秦朝，儒家在中国并没有特殊地位，儒家的教训并不是正统。儒家只是各家各派中的一个派

《商子（商君书）》第一章第四节。

别 为了本身的存在 尽力维持自己的地位与各家相抗衡。

（二）前汉的儒家是最具特权和权威的派别

公元前一百三十六年 董仲舒奏请汉武帝禁止六经以外一切书籍的流通，儒家从此在中国历史上享有特别尊崇的地位。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 正式宣告儒家的地位 六经是儒家经典 此后成为钦定的经典。

对儒家的尊崇似乎是提升儒家经典至正统地位的第一步行动。可是，我们不要认为汉武帝的尊崇儒术使六经第一次为大家所认识。甚至不要认为汉武帝的尊崇儒术使儒家得到特殊的地位。六经的存在，在汉以前已经有很长一段时期，甚至古人早就知道六经的名称。《庄子·天下篇》中说：“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①这段话告诉我们，在汉武帝之前，六经早就被承认了，汉武帝的贡献，只是将既存的事实加以明白的宣布而已。虽然《天下篇》的真实性有时被人怀疑，就是说，《天下篇》是不是庄子作的还是一个疑问，可是，它说到六经一点，显然表示在汉武帝之前，六经早有很高的地位，也说明了为什么六经被尊为权威。

儒家经典享有特殊地位 并不始于汉武帝 汉武帝所做的 只是正式宣告它的既存权威性而已，换句话说，孔子编述而深植于中国人心中的经书，早就广为流通，早就为人所称道了。我们可

^①《庄子》第三十三章《天下篇》。

以看到儒家在发扬最早为中国人心灵所熟知的经典时，它不需要像老子与墨子一样去保护一种新思想路线。

在官方认可儒家经典的地位以后，国家设置的太学中，便研习儒家经典，国家还设置博士官来解说儒家经典。不过，即使得到了这种正统性地位，六经的普遍并没有达到使其他各家消灭的程度。六经的被尊崇，只表示国家取士举行考试时，要求士子只能基于六经应试而已。其他学派的书则不能合于此要求。司马谈《六家要旨》表示 虽然明显地重视儒家 其他各家的主张也同样地受到重视。

事实上 尊崇儒术一部分也是由于秦汉大一统帝国之建立。汉武帝的作为甚至可以视为秦始皇焚书或思想统制政策的延续，只是汉武帝没有秦始皇那样激烈而已。

自从儒家经典被国家正式认可以后，儒家哲学便日益形式化而失去原有的活力。此后儒家分为两支：一支遵循今文，另一支遵循古文。当国家设置博士官专门讲解经书时，五经博士所用的经书是用今文写的；可是，后来发现了另一种用古文写的经书，《春秋左传》便是其中之一。许多学者不赞同新发现的古文经书，因为 如果承认新发现的古文经书 便表示放弃自己所持的今文经书。因此 儒家便分为两支 此后 有一个长时期 两支相互冲突争论。国家设置的太学中 博士们主张用今文 而西汉末年的刘歆却主张加入古文 认为古文经书也是真正的儒家经书。东汉 中叶 两种经书在郑康成和其他一般人手中已开始融合的过程了。

但是 这种经书的注释工作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 于是 道家和佛家思想便开始进入人们的心中。

（三）儒家光彩为佛道二家掩盖

秦汉两朝完成了帝国的政治统一工作。随着政治大一统而来的对儒家经典的尊崇，确是文化统一过程中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说 两汉（前汉或西汉与后汉或东汉）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倾向于宗教的时期。方术、迷信、占星术、通神术，在当时很流行。在那个时候，任何创立宗教的人都可以运用这种心理创设一套信仰。事实上，道家（就作为宗教而言）和佛教都是后汉开始的。

董仲舒是第一个建议汉武帝尊崇儒家经典的人，他在上武帝的奏章中说：“臣谨案春秋之中 视前世已行之事 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①

董仲舒这些话的意思是说，国家的失道之败是会带来灾祸和天怒。这又表示，天可以显出幸与不幸，喜与怒。我们不能说董仲舒所说的天是指上帝，不过，无论如何，他相信天知道人世间的事，也知道如何惩罚那些召祸的人。董仲舒之相信人事与天象间的相互关系，是由于他相信阴阳五行说之结果。

但是，表示两汉的特色为宗教倾向的最好证明，是下述的明显事实，即，在这个时期，孔子不被视为教师或人：他被视为神。春秋纬汉含孳中说：“孔子曰：‘邱览史记 援引古图 推集天变，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为汉帝制法 陈叙图录。”^①如果汉朝的制度真在孔子书中发现的话，那么，孔子不是先知吗？

另一部纬书《演孔图》中说：“孔子母徵在，游于大家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己往梦交。语曰：女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在苦感生邱于空桑之中。故曰元圣。首类尼邱，故名。孔子之胸有文曰：‘制作定 世符运……’”^②

孔母怀孔子的故事，与基督徒所熟知的圣母玛丽亚故事非常相似。“制法者”的孔子 无论从那个角度去看 都被视为先知和预言者。

这个故事是典型的汉朝式故事。汉代的纬书只能产生在这个时期。其他主述孔子的文字可以在同时期的石刻中发现。这些记述可以上溯战国时代的阴阳说，是在汉朝时以最生动的方式作成的。

由于这种流行的心理倾向，所以，本土产生的道教和印度传来的佛教，在东汉便大有进展。后汉书中一段话，充分表现了 this 早期道教的本质。“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 事奉黄老道 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 以善道教化天下 转相诳惑 十余年间 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角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③

最后，朝廷注意到张角的活动，认为这种教徒是叛逆，便采取手段压制。

另一个和道教建立人有关系的人物是张道陵。《三国志·张鲁

① 《春秋纬汉含枢》。

② 《春秋纬汉含枢·演孔图》。

③ 《后汉书》卷一〇一 《皇甫嵩传》。

传》中说：“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① 道教的教规可见于于吉的《太平经》。书中含有下述五条戒律：

1. 不饮酒。
2. 按季节生活，意指春秋两季不杀生。
3. 建造屋宇免费供行旅休息。
4. 互助。为富不仁是罪过，强而不援弱者也是罪过。
5. 人有病时，只要自承过错和饮用圣水便可痊愈。

这些规则后来被修改过。虽然张角和张道陵是道教的实际创始者，可是道教信徒总认为老子是他们的教主。老子在道教的地位相当于基督在基督教的地位。道教的经典是老子和庄子的著作。

道教在中国经过长时期的发展。从它对来生和另一世界的意义上看，道教不是纯粹的宗教。其实，道教试图延长此生的寿命。为了这个目的，还显了许多奇迹。作为宗教的道教和作为哲学的道家是不同的，两者不可相混。后者远比前者为属于思辨性的，也更为纯粹。

道教历代天师都居住江西龙虎山。第一代天师于公元一〇一六年为宋真宗所敕封，但道教教徒总喜欢将他们的脉承上推东汉的张道陵。到了明初，道教共有四十二位天师……（略）

对于中国本土的道教，我们说得够多了。现在来谈谈从印度传来的佛教。佛教一向被认为是东汉明帝即公元六四年传入中国的。明帝夜梦金人，约十尺半高，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于是以此召问群臣，传毅告诉明帝：“这是印度的佛。”于是明帝遣使去印

① 《三国志》卷八《张鲁传》。

② 《太平经》（被认为是最早的道家经典。该书原有一百七十卷。现在只剩下六十七卷，其他都已散失）第八十五节。

度求回佛经。

佛教传来中国归之于南柯一梦之说，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皇帝一梦无法教我们了解佛教为什么传来中国。

我个人的解释如下：张骞于公元前一三八年出使西域，一二三年左右到达大月氏。他的抵达不但对汉武帝是一件大事，对印度的佛教徒也是一件大事，因为他们正等着打开一条到达中国的路。公元前一二三年以后，许多印度和中亚细亚和尚们学习中文准备来中土传教，从公元前一二三年到公元后六四年之间这一段长时间，虽然史籍记载汉明帝遣使去印度求经之事，可是，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到底怎样，我们不甚了然。不过，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即明帝弟楚王英传中有一段话，引述公元后六五年明帝的诏命，命楚王英将其贡与明帝的丝送给优婆塞和沙门，这里使我们不禁奇怪，如果佛教只在早一年传来中国，怎会用上优婆塞和沙门这类的译词。明帝在位期间是公元五八年至七五年，与公元一世纪北印度 Indo Scythian 王迦腻色迦同时 迦腻色迦是大月氏的征服者，在佛教传来西藏和中土这件事上，他无疑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不过，我认为佛教必定在明帝得梦之前很多年，换句话说，必定在公元六四年前很多年传入中国的。明帝之梦也许是佛教徒的一种正式宣示以纪念佛教在中国的诞生。

以优婆塞和沙门这些译名的使用来看，我们不得不假定，它们必定早于印度和中亚细亚和尚学习中文并习于翻译佛语为中文的时期。大约要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来完成各种准备步骤，也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才会使皇帝的诏命中用上这些名词。因此，我认为佛教传来中国的时期，只能在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之间，根据魏书佛老一卷的记载，哀帝在位期间，有一位博士弟子曾习浮屠经，《魏书》是这样说的：“哀帝元寿元年 博士弟子